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

黄琪轩

【内容提要】 近几十年来,世界面临发展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削弱了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让整个世界都面临发展困境,也使得危机的根源难以消除。世界性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美国对世界发展模式的塑造。美国通过国际组织以及理念输出等方式,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改造了发展中国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之进程。国家构建的缺失使得发展中国家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在后危机时代,美国相对衰落,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象;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制约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广;中国的成功还让世界有了不同的发展理念。因此,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机会。

【关键词】 发展困境;国家构建;新自由主义;中国

【作者简介】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 邮编:200030)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1)01-0025-21

^{*} 本文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10年学术年会,该文初稿在“第一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上进行了宣读。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以及傅军、陈小鼎、黎晨、左亚娜、赵瑾、刘娟凤、孙志富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一 世界面临发展困境

2007年,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席卷美国,随后在全世界引发了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波及了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也引发了全球企业破产浪潮。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指标急剧下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为应对危机,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各方努力下,各国陆续出现了经济回暖的迹象,对后危机时代的探讨也提上了日程。

尽管危机已经逐渐过去,但是此次金融危机背后还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危机,即世界面临着持续的发展困境。此次金融危机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世界面临发展困境所积累的矛盾的一次爆发。如果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危机也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我们知道,世界性的金融权力需要有国内的社会基础。^①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能改善国内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这样的政策就能有效拓展该国金融权力的社会基础,进而增强该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性的金融权力也需要国际性的社会基础。如果全世界的不平等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陷入困境,那么世界金融秩序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就难以稳固。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困境也在动摇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这正是我们时代的难题。

我们知道,近几十年来,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前苏东转型国家,政治经济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乏善可陈,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在1960-1980年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期间,拉美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1%;而在1980-2000年间,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急剧下滑,仅为0.7%。在2000-2005年间,情况也没有好转,拉美国家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仅为0.6%。^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贫困率从1980年的40%上升到了1990年的48%;直到2005年,贫困率才重新降到40%。因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这个地区花了25年的时间,把贫困降至1980年的水平。^③

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也面临持续的发展困境,而且问题比拉美

① Leonard Seabrooke, *The Social Sources of Financial Power: Domestic Legitimac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d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Ha-Joon Chang,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ariffs? How WTO/NAMA Negotiations Could Deny Developing Countries' Right to a Future," *The South Centre*, 2005, p. 72.

③ Laura Macdonald and Aime Ruckert,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Americas: An Introduction," in Laura Macdonald and Aime Ruckert, eds.,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4.

国家更为严重。一般而言,危机是相对短暂的,而非洲国家的困境被称为“持续的危机”。^①在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倒退,每年减少1.2%。到了90年代,该地区居民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仅为0.2%。在2000-2003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人均收入增幅有所提高,达到了0.5%。即便如此,如果非洲国家继续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到2020年,其人均收入还低于1980年的水平。^②

除了拉美和非洲地区,前苏东国家也面临长期的发展困境。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伴随着痛苦的过程,不少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就俄罗斯的情况而言,“1989年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中;而到了1998年下半年,该数字飙升到23.8%……有超过5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③即便绩效相对较好的亚洲地区,在1997年也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亚洲积累的大量财富在顷刻间消融。

因此,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持续的发展困境。世界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的分化越来越严重。^④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又使世界增加了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而困境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持续的分化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内战以及世界恐怖主义的泛滥。在1950年的时候,卷入内战的国家占世界国家总数的5%左右;到了1990年,这个比重接近20%。而且是经济越不发达,受内战的困扰越严重。1995年以后,卷入内战的非洲国家数量还在迅速上升。^⑤由于内战,难民也随之成为越来越严重的世界问题。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动荡也为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从1982年到2003年,重大恐怖袭击的数量显著上升:在1982年,全世界发生了20余起重大恐怖袭击;到了2003年,重大恐怖袭击上升到了近180起。在短短二十几年间,重大恐怖袭击的数量增长了8倍多。^⑥

① Nicolas van de Walle *African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1979-199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9.

② Ha-Joon Chang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ariffs? How WTO-NAMA Negotiations Could Deny Developing Countries’ Right to a Future,” p. 72.

③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李扬等译:《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④ 有研究指出,以国家作为统计的基本单位,世界富国与穷国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尽管全球的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是分布却非常不平衡,脱贫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参见 Dominick Salvatore,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Editor’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26, No. 4, 2004, p. 640.

⑤ Nils Gleditsch, Peter Wallensteen, Mikael Erkksson, Margareta Sollenberg and Havard Strand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5, 2002, p. 616.

⑥ Alan Krueger *What Makes a Terrorist: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5.

因此,在主要经济大国走出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仍面临更深层次的、更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会恶化,也会波及发达国家,全球经济秩序的社会基础也会动摇,也为以后全球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因此,发展困境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发展困境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境。

经济学家常常指出,后发展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后发展国家既能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教训,也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因此,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小,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趋同。而事实上,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并没有趋同,相反,世界的分化却在加剧。如果这样的分化还在继续,我们很难说世界走出了危机,而这样的结构性分化也可能会损害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世界各国不仅需要增强国内的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也需要增强世界的社会凝聚,只有这样,世界经济才能有效地运行。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世界性的发展困境呢?在后危机时代,这一困境会继续恶化,还是会有所缓解?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哪些机会呢?

世界性的发展困境一直在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只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往往给出大相径庭的答案。有的研究者强调技术进步,认为如果技术进步乏力,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越拉越大;也有的研究者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势必导致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新制度经济学家常常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产权保护,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增长,世界各国的差距也可能越拉越大。^①还有的研究者强调关税的重要作用,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实施关税政策,不能为国内的产业提供有效的保护,则它们的产业会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②也有学者强调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认为世界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依附。依附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发达国家,因此,是发达国

① 关于上述论点以及有关地理、殖民历史、分配不均、贸易等问题对发展与分化影响的研究综述,参见 E. Hanan Helpman,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8.

② Ha- Joon Chang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ariffs? How WTO-NAMA Negotiations Could Deny Developing Countries’ Right to a Future,” p. 101.

家的发达造就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①此外,还有的研究涉及地理、殖民历史、分配不均、贸易以及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对研究世界性的发展困境都非常重要,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前期研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世界政治的权力分布给世界发展困境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本项研究试图提供的视角。

本项研究试图展示,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世界经济霸权美国对世界发展模式塑造。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发展模式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 (state building),使得它们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的分化主要源于国家构建的分化,而国家构建的分化离不开外部权力的影响。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世界的权力分布再次发生改变,这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

二 国家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的发展往往离不开现代国家的发展。无论是市场的建立、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有效的关税保护、有效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现代国家。而国家构建的任务即建造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有效解决政治体系融入社会的问题,国家的政策也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当前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的困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缺少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也步履维艰。

国家构建有几个基本的阶段^②和一些基本的任务,只有完成了一些基本的任务,现代经济才成为可能。

首先,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统一 (integration)。国家构建不仅要做到领土统一,还要做到经济的统一。国家不仅需要消除地方武装势力,还需要消除地方的经济分隔,把国家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统一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地方武装势力割据,市场也由各个地方势力所分割,因此,发展现代经济也无从谈起。主流经济学往往假定存在一个自发的市场秩序,而事实上,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内市场的统一往往要靠国家大规模的、持续的干预才能实

^①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Vol 18 No 4 1966 pp. 23- 28

^② 查尔斯·蒂利把国家构建分为几个阶段,即渗透、整合、扩大政治参与、构建身份认同、建立正当性以及再分配等。参见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08- 609.

现。^① 美国甚至不惜用内战这种极端的做法来将美国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而在这一点上,大量的后发展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次,国家构建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渗透 (penetration)。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国家会逐渐消除地方势力、教会力量和贵族力量等与之竞争的力量。把人们对宗教、地方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只有当国家有效地渗透到社会,国家才能将自身的政策贯彻实施。民族主义是国家完成渗透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构建往住和国家构建交织在一起。有研究指出,西方世界的兴起离不开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资本主义精神却不是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所讲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② 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中来。因此,民族主义是国家渗透到社会的重要工具。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民众效忠的对象仍是自己的宗族、村落,却不知道有国家。在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训时,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指出:“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 19 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他指责当时的湘军“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③ 而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与清末时期的中国并无二致,它们的情况甚至更糟,国家渗透的工作也远未完成。

最后,国家构建还需要建立强大的官僚系统。有了强大的官僚系统,国家的统一工作、渗透工作以及由此相伴随的征税活动才能有效实施。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有着较强的官僚队伍。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雇员数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越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越低。发达国家政府雇员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7%,居于世界最高水平;而非洲国家政府雇员仅占总人口比重的 2%,位居世界末位。中央或联邦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1.8%,也是最高的;而非洲为 0.9%,仍名列末位。地方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重,发达国家为 2.5%,非洲国家为 0.3%。由此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并非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即便到了今天,发达国家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发达国家

^①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 140.

^②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0 页。

有着庞大的官僚系统,其经济社会职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履行。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雇员不足,很多基本的国家职能都无法履行,经济发展也无从谈起。

表 1 20世纪早期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重 (%)

国家 地区	所有政府雇员	中央(联邦)政府雇员	地方政府雇员	教育与卫生事业的政府雇员
非洲	2.0	0.9	0.3	0.8
亚洲	2.6	0.9	0.7	1.0
前苏东国家	6.9	1.0	0.8	5.1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3.0	1.2	0.7	1.1
中东和北非	3.9	1.4	0.9	1.6
经合组织国家	7.7	1.8	2.5	3.4
全球平均	4.7	1.2	1.1	2.4

资料来源: Salvatore Schiavo - Campa, Giulio de Tommaso and Amitabha Mukherjee, "An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Survey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and Wag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World Bank, No 1806, 1997, p. 5.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根源”。^①只有发展中国家有了较好的国家构建,才能有效地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必要的帮助,也才有可能摆脱发展困境。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极大地削弱了。这让人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的弱化呢?当然,发展中国家自身要负一定的责任,除此以外,享有优势地位的美国给发展中国家施加的约束可能要负更大的责任。

而本文将会展示,美国用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国家构建的时候,这一模式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工作受挫,进而也挫败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三 美国重塑世界发展模式——通过国际组织

要理解发展中国家国家构建的失败,除了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以外,还离不开考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

察国际格局的变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苏联经济遭遇更多的困难, 相对而言,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开始增强, 美国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努力也随之增强。90 年代初苏联解体, 美国优势地位更加巩固, 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更为明显。同时,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更大的自由化压力。^①

苏联解体以后, 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非常显著, 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 其他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与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的军事开支优势十分明显。2006 年, 美国的军事开支是第二号大国的十多倍。同年,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世界经济规模的近 1/3 是日本的三倍, 是中国的五倍。在国际关系史上, 美国这种优势地位是 1750 年以后的世界政治中从未出现过的。因此, 这是一个美国享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却没有遇到有效制衡的时代。^② 在美苏两极格局期间, 美苏之间的发展模式还存在竞争, 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到了苏联发展式微, 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 世界缺少了替代性的发展模式。美国开始利用其史无前例的优势地位, 向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情况下,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就被美国重新塑造了。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倡导一个 D-L-P 公式, 即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与私有化 (privatization)。^③ 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份菜单开始实施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在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国家构建的时候, 美国利用自身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 用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它们的发展模式, 进而瓦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

美国向全世界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有着几种重要的方式, 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美国通过援助和制裁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除此以外, 美国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还有几个更加隐蔽的方式, 即通过国际组织与通过理念输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 在不少场合充当了美国重塑世界的工具。美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撬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变迁, 要求发展中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推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以及私有化。

我们看到, 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也指出, 金融自由化既不是快速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中国和印度都有选择性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但是经济业绩比其他金融

① The Editors "Betwee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Another World: Interrogating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2008 p 164

②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

③ Manfred Steger and Ravi Roy, *Neolibe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

自由化的国家都好),也不是快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①相反,金融理论宣称没有管制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即便发达国家也对此长期持谨慎态度,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金融实施严格的管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才开始放松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但是美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尽快地进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导致热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金融风险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吸引长期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②既然知道金融自由化有如此重大的问题,为何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如此热衷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呢?要理解这样的政策偏好,也离不开对美国优势地位的考察。

美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储备堪称世界之最,美国金融部门的管理技能娴熟。我们可以说,美国金融部门在全世界享有的绝对优势是无人能企及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为美国金融部门的投机行为带来丰厚的利益,还能为美国左右他国的政治经济打开方便之门。即使金融自由化存在风险,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帝国,其抗风险的能力也远远强于发展中国家,各方承担的风险与收益并不对称。因此,冷战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倡导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两家机构都是由发达国家控制,尤其是由美国控制。根据惯例和不成文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负责人一般由美国人担任。^③即便在欧洲人担任负责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仅有一个国家具有有效的否决权,即美国。美国正是通过影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发展中国家接受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新的传教机构,通过它们,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勉强地在贫穷国家推行,而这些贫穷国家往往非常急切地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赠与。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经常会怀疑这些政策,但是如果必要的话,这些贫穷国家的财政部长们宁愿改变他们的信仰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④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极其严格的限制性贷款,让拉美国减少财政支出、取消贸易保护、禁止其货币贬值、防止工资上涨,以让拉美国

① Eswar Prasad Kenneth Rogoff Shangjin Wei and Ayhan Kose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MF Occasional Paper No 220 2003

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56-57页。

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14页。

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9页。

家最终实现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拉美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不得不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资产,停止对失利企业的补贴。这一过程让拉美穷人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却没有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心。为了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督,世界银行还设计出了一套结构调整贷款(structural adjustment loans),只有当这些国家的政策转向能满足其要求时,才向它们发放贷款。^①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常常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化的调整。

在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上,这两家机构都可谓不遗余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东亚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韩国接受了相当苛刻的金融自由化的条款,而这些条款是美国在与韩国几十年的双边谈判中根本无法让韩国接受的。现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美国顺利实现了自己的目标。^②尽管金融自由化让亚洲承受巨大的风险,金融自由化改革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将之在亚洲各国推广。它们的努力如愿以偿,它们打开了亚洲国家金融市场的大门。同样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一张比较有争议的照片还引发了印度尼西亚民众的游行。在这张照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双臂交叉,站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旁边,他的姿态让人觉得是在羞辱苏哈托,苏哈托在温顺地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协议,像是在给西方签署投降书。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转向并非自愿的,而是面临很大的外部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声称它从来不下达任何指令,每一个贷款协议都是与借贷国就贷款条款进行谈判而达成的。但这些谈判都是一面倒的,在谈判过程中,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的国家都迫切需要资金……韩国的经济学家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他们国家的政策将会是灾难性的……但韩国的经济官员们却都保持沉默……他们不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公开地表示反对。”^③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能够削减对韩国的贷款,而且还能影响其他国家和机构对韩国的投资。在权力极度不平等的情况下,韩国没有办法,只能对强加的条款保持沉默。我们看到,连韩国这样有较强国家能力的“发展型国家”都难以抵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攻势,签署

^①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pp. 114-115.

^② Jonathan Kirshner,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Jonathan Kirshner, e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3-14.

^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35-36页。

“不平等条约”，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更难以抗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政府的要求。

美国不仅通过国际组织推进金融自由化，还试图通过国际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管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外资加以严格控制，以便让外资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美国历史上对投资的管制更为明显。从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直至20世纪中期，为了让国家不受外资冲击，保证国家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了大量的法律以保证战略部门不受外资控制。这些部门涉及金融、造船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①而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敦促发展中国家放弃对外资的管制。由于外资的涌入，外资逐渐取代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工业，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技术反而出现了退化。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还导致发展中国家买办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依附于外资，并试图阻挠技术升级，以获取买办利益。^②

此外，美国还通过国际组织敦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在某些条件下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正面的影响，但是被外部势力强加的、不分发展阶段的、无条件的贸易自由化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欧美历史上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保护，英国与美国在其经济的赶超阶段，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它们的关税税率达到了45% - 55%）。^③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却通过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大肆推行贸易自由化，而且是让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为“自由”的贸易自由化。即便是美国推动贸易自由化，也是有选择性的。在美国享有世界政治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世贸组织的议题和决议往往被其左右。

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服务贸易纳入到谈判的议题，这是在为美国庞大的服务业打开世界市场。美国的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巨大的优势，服务贸易的拓展能让美国获得丰厚的回报。尤其是美国金融部门的服务和信息技术的服务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也力图通过世贸组织推动这些领域的自由贸易。但是，“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却不包括海运服务和建筑服务，而这些服务业正是发展中国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美国吹嘘各国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利益，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成比例的利益份额……世界银行的一项计算表明，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南部非

① Ha- Joon Chang and Duncan Green “The Northern WTO Agenda on Investment Do as We Say Not as We Did” South Centre/CAFOD, 2003 p. 7

② Devora Grynspan, “Technology Transfer Pattern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DCs: A Study of Licensing in Costa 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4 1982, pp. 795 - 806

③ Ha- Joon Chang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ariffs? How WTO NAMA Negotiations Could Deny Developing Countries’ Right to a Future,” p. 36.

洲,因为乌拉圭回合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收入下降超过了 2%”。^①

由此看来,即便世贸组织这样一个表面上看各成员国地位相对平等的组织,仍然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左右,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对世贸组织的决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平等地位仅仅是“有组织的伪善(organized hypocrisy)”,世贸组织的决策还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②而美国正是凭借其优势地位,影响世贸组织决议,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上面的例子让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贸易组织,都受到了美国权力的影响。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美国更巧妙地包装了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也正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美国成功地重塑了世界的发展模式,也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除了通过国际组织,美国还通过另外一个更为隐蔽的方式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即通过价值观念。

四 美国重塑世界发展模式——通过价值观念

除了通过国际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以外,美国还不遗余力地输出其价值理念。有研究宣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及其价值理念给世界带来了深层次的危机,因此,他们是全球危机的制造者(global crisis makers)。^③正是这些经济学家主导了国际金融机构,影响了政府决策,让政府放弃对经济的积极管理。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影响了世界经济模式的转向。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跨国联系和影响巨大的智库。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史开夫家族慈善信托基金(Scaife Family Foundation)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为他们的学术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这些学术共同体向世界推广其经济信仰,让世界变得更“新自由主义化”。但是,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这样的思潮是难以主导世界的。在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下,美国经济学规范开始塑造全球经济学的职业规范。^④美国通过其各种学术机构,向世界输出其价值理念,塑造学科规范,进而转变世界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比较直接的做法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

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53页。

② Richard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339-374.

③ Graeme Donald Snooks *The Global Crisis Makers An End to Progress and Liberty?* London Macmillan 2000

④ Marion Fourca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Profession: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2, No 1, 2006, pp. 145-194

人才。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芝加哥男孩 (Chicago Boys)”。

为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理念,芝加哥大学设立了“智利计划”,这个计划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培养人才,在思想领域展示与苏联的竞争。在1957年,芝加哥大学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智利培养经济事务上的知识领袖。”而美国国务院正是这个计划的资助者。他们从智利天主教大学的交换项目中选拔学员,输送到芝加哥大学学习。而这群智利青年的精神导师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到了1965年,这个项目从智利扩展到了整个拉美地区,其中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显得更为积极。^① 这个项目用比较隐蔽的方式,为拉美地区培养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的新生力量。

除了芝加哥大学以外,还有一批拉美学员在美国其他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或者在美国大学接受了培训。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承担了培训任务。在20世纪70年代,佩德罗·艾斯普 (Pedro Aspe)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担任了墨西哥的财政部长。阿里加多·弗克利 (Alejandro Foxley)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后来他担任了智利的财政部长。多明戈·卡瓦略 (Domingo Cavallo)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担任了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在美国期间,这些未来的拉丁美洲财长和未来的世界银行副行长、继而又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成为好友。这些拉美学员也同时与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成为了好友。萨克斯后来成为拉丁美洲和苏东国家自由化改革的智囊,再后来,人们熟知的就是萨克斯倡导的改革对苏联造成的持续损害。这些拉美学员还同斯坦利·费希尔 (Stanley Fischer)会面,而费希尔后来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因此,拉美学员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② 这样的跨国知识群体及其信奉的理念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础。

这批拉美学员学成回国后,很快占据了拉美学界与政界的重要岗位,并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施。到了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13名全职教授中,有12名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这些“芝加哥男孩”回到智利以后,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自由化改革,让价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

^① 关于这个项目的展开过程,参见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7, pp. 57-71。这一领域的著作还可参见 Gabriel Vukobratović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Mark Berger “Up from Neoliberalism: Free-Market Mythologies and the Coming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2, 1999, pp. 454-455。

在 1973 年,智利的国有企业达 500 多家;到了 1980 年,降到 25 家。^① 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拆散了智利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波及整个地区,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原来是依附论的学者,后来转变成成为自由主义者,并当选了巴西总统,引导了巴西的自由化改革。

美国的理念输出不仅限于拉美地区,也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洲和非洲。在印度尼西亚,也存在一个与“芝加哥男孩”类似的“伯克利集团(Berkeley Mafia)”。从 1956 年开始,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有一批印度尼西亚学生到美国学习。他们回到印度尼西亚以后,开始按美国倡导的经济模式改革印尼。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到拉美的圣地亚哥,帮助智利建立新型的经济学系。而福特基金则把美国的经济学家送到雅加达,帮那里建立起了新型学校。福特国际培训和研究项目部的主管指出:福特总统认识到,当苏哈托淡出政权后,这些接受过美国培训的人员会领导这个国家。^② 而正是这个集团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美式的价值观,让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印度尼西亚落地生根。

因此,美国培训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向世界输出其价值理念,新自由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趋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输出的这一模式并非美国的成功经验。恰恰相反,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政治经济体之前,政府一直在起积极的作用。美国政府长期实施高关税保护,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即便是二战以后,美国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守夜人的国家。^③ 美国国内的经济干预相当显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联邦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尤其是促使企业技术升级方面。美国政府不仅实施贸易保护,还直接补贴研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占到研发总额的 47% - 65%。^④ 没有美国的产业政策,就难以看到当今美国在飞机、计算机、芯片、互联网等领域的成就。因此,有研究宣称美国是“隐蔽的发展型国家(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⑤

①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pp. 239-240.

② David Ransom, “Ford Country: Building an Elite for Indonesia” in Steve Weisman, ed., *The Trojan Horse: A Radical Look at Foreign Aid*, Pab Alti Ramparts Press 1975, p. 99.

③ Mary Hawkesworth “Neoliberalism and the Micropolitics of D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ura Macdonald and Ame Ruckert eds.,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Americas*, pp. 167-183

④ Ha-Joon Chang “Industrial Policy: Can We Go beyond an Unproductive Confrontatio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pp. 8-9

⑤ Fred Block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2008, pp. 169-206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隐蔽的发展型国家”,却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国家构建,放弃了对经济的积极管理,让发展中国家丧失了对国外与国内经济的管理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非是世界主义,而是变相的民族主义,这是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它推广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措施,却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①发展中国家在最需要发展国家能力进行国家构建的时候,却被美国的发展模式瓦解了国家构建这一意义重大的工作,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持续的发展困境。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国家构建时,这样的发展模式给它们带来的问题更大。

由于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紧缩财政,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削减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被大幅度私有化。公共服务的减少对穷人造成了持续的损害,也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研究甚至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要对非洲艾滋病的泛滥负责。^②由于过度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解决艾滋病问题,政府的无能与放任使艾滋病在非洲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全球性的自由化改革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③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国内矛盾持续紧张,国家却缺乏必要的救济措施,矛盾的持续激化甚至引发了暴动。“2001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了……最终,在连续七年的高失业率情况下,阿根廷的市民不得已发生了暴动,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能够非常安静地忍耐这么长的时间。”^④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家构建的缺失,这些国家难以有效整合社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量的认同危机,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战,恐怖主义也就找到了滋生的温床。

因此,当发展中国家正需要国家构建的时候,美国向世界推广的新自由主义严重削弱乃至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构建,致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而带来了持续的发展困境。因此,有学者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冒牌的自由的世界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其权力,推行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政策……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它们利用世界治理机构

① Julius Kiiza “Mercanti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 and Uganda” in Joseph Mensah, ed.,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Africa: Contestations on the Embattled Contin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77–202.

② Colleen O'Manique, *Neoliberalism and AIDS Crisis in Sub-Sahara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③ Ray Kiehl,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Liberalisation? Neoliberalism and the Myth of Global Converg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3, No. 3, 2007, pp. 415–434.

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14页。

征服了南半球的弱势国家, 不让发展中国家推行有利于自己国民福利增长的发展战略”,^①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而中国的迅速发展则为发展中国家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机会。

五 中国的发展: 替代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 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业绩。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在迅速崛起。2010年, 中国的经济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 当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受访民众被问及: 中国与美国的影响力在受访国家是否上升的时候, 中国表现不俗, 在非洲的表现更为显著。在接受调查的十个非洲国家中, 认为中国影响力上升高于美国的占了七个。在马里, 中国的影响力比美国多出 23个百分点; 而在科特迪瓦, 中国比美国多出 24个百分点; 在塞内加尔, 中国多出 28个百分点。在拉美的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家, 也有更多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上升。^②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在继续, 世界各国都看好中国的前景。如图 1所示, 大部分国家的受访者认为, 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会和美国经济实力旗鼓相当, 甚至超过美国。中国的成功经验是中国政府没有放任市场的扩张。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扮演了积极角色。因此, 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市场化, 成功的市场化需要政治前提, 即成功的国家构建。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的经济模式时指出, 中国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 (1)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 (2) 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 (3)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4) 自由竞争的商品 - 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国”, 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 故称“国民”经济模式。^③正是由于中国对土地、金融、大型企业以及事业机构的有效管理, 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才能更有效地化解国内外政治经济难题, 这些经验是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

① Peter Evans, “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 Society*, Vol 36 No 2 2008, p 282

② The Pew Global World Attitudes Project, “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47-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2007, p 43

③ 潘维、玛雅:《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 载《开放时代》, 2009年第5期, 第1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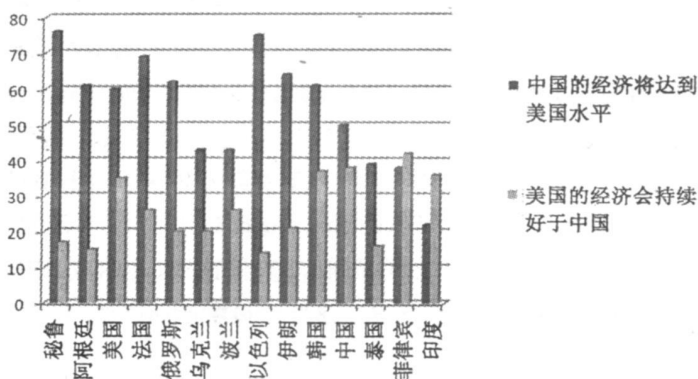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各国对未来中美经济的预期

数据来源: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orld Publics Think China Will Catch up With the US and That's Okay*, 2007。

中国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而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提供了另外的可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国发展的成功,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学习与效仿中国的成功经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相互效仿对方成功的经验。^①这种效仿不仅存在于安全领域,也存在于政治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的经济业绩也让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中国的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一直强调对发展和转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长极为迅速时,中国也依然关注西部省份、东北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②中国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对公平与正义的关注,也一直注意国家构建,引导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因此,这一成功的故事使得发展中国家有了新的效仿目标。除了美国模式以外,它们有了其他选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相似的经历,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参考价值。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使用强制、威胁乃至暴力

① João Resende-Santos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46

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文版序言。

的手段促使一些国家满足美国的需要。因此,美国的发展模式有着明显的强制性,美国在世界推广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自由。^① 而中国不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他国,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传统,尊重各个国家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派学员到中国学习中国经验。北京大学就设立了相应的“发展中国家高级行政人员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Program in Public Policy for Lead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该项目学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师,他们来自马拉维、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南非、孟加拉国、蒙古、越南、菲律宾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这些学员学成回国后,将成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改革与调整的积极力量。

第二,中国的发展是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牵制。权力分布的调整是影响未来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一项重要基础。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发展使得世界的权力分布重新做出了调整,这就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中国的影响和帮助下,发展中国家抵消美国影响力的力量在增强。

事实上,在当年日本崛起的时候,日本政府也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曾经试图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90年代初期,日本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颇具争议的报告——《东亚的奇迹》——向世界提出新的发展宣言;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试图建立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并企图将美国拒之门外;在亚太经合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日本也试图排除美国干扰。^② 此类事件不一而足,但是,日本却没有成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日本土地面积狭小、人口相对稀少、自然资源匮乏,军事上也依赖美国,这些结构约束使日本难以独立行事。此外,日本的经济奇迹没有持续,也让它为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的努力没能实现。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世界再次面临新的可能。

“中国崛起的意义极其重大。中国不像日本或台湾地区,它不是美国的附庸,中国也不是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尽管它的军事力量不能与美国相比,其制造业增长仍然依赖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但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对进口廉价中国商品的依赖以及对美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如果说不是更大的话,那也同样很大。更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取代美国,成为带动东亚和其他地区商业与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③随着中国国家

^① Vedi Hadiz “Introduction” in Vedi Hadiz ed., *Empire and Neoliberalism in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

^② Yong Wook Lee, *The Japanese Challenge to the American Neoliberal World Order: Identity, Mea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2.

^③ [意]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实力的增强,中国也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支配性影响。

我们前面提到,在美国享有优势地位的时候,美国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组织,通过它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组织中出现了平衡的声音。有学者指出,“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①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对话让国际组织出现了另外的声音,这有利于打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组织议题的局面。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在增加;同时,中国对世界银行的制约也在增多。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冲击了国际组织的贷款,它们难以再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与贷款挂钩。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使得世界银行不得不调整在非洲的工作,由于非洲业务的萎缩,世界银行不得不减少雇员。因此,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对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增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它们能够摆脱美国以及国际组织设定的新自由主义议程,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同的价值理念。当前,美国向世界施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遭遇了正当性危机。目睹了美国向世界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国际知识界也形成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后华盛顿共识重新认识到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②而中国的迅速发展为这些学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学术市场。一些经济学家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以及拉维·坎布尔(Ravi Kanbur)等开始更为有力地质疑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学者不时地表达了对中国经验的欣赏,中国经验也常常是他们笔下的最重要论据。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学者也开始意识到需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③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在各自的领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中国理念与知识。因此,在发展理念上,中国的知识界和国际知识界开始尝试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不同于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大的空间,它们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发展理念。

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文版序言。

② Ziya Onis and Fikret Senses “Rethinking the Emerging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6 No 2, 2005 pp 263-290

③ 王正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1页。

还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合作更加深入地展开,中国的贸易、国际直接投资、金融、全球治理、移民、环境等问题都在影响其他国家,进而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在影响其他国家。^①发展中国家在与中国的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有更多的机会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与改进。

从2001年开始,很多反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分子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WSF)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②美国的霸权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③而中国的迅速发展让另一个世界变得更为可能。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目标,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制约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广。此外,中国的成功还让世界有了不同的发展理念。面对新自由主义世界性的扩张,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实际上,我们有选择,迅速发展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六 结论

本文试图展示,世界性的发展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界经济霸权美国对世界发展模式的塑造。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家构建,使得它们既无力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也无力整合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正需要加强国家构建的时候,却受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束缚,致使其国家构建失败。由于国家构建的缺失,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融入社会,不能让自身的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也无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制度、产业保护等基本条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的分化会损害世界经济的社会基础,在一个缺少社会凝聚的世界,世界经济也难以有效运作,全球化也难以有效推进,危机的根源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消除。在后危机时代,美国相对衰落,迅速发展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为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提供了新机会。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是一次契机。危机中往往有受损者,有获益者,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往往能改变以往的力量分布,无论是国际的力量分布还是

^① Raphael Kaplinsky and Dirk Messner “The Impact of Asian Drivers o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2, 2008, p 205

^② The Editors “Betwee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Another World: Interrogating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pp. 164-165.

^③ Peter Evans “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 284

国内的力量分布。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挫败了国内的保守力量,使得国际主义的势力大获全胜,也让美国开始以更高调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塑造世界经济。^①而 80 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也使得美国能够对拉美施加更深刻的影响,促使拉美做出重大调整,放弃了长期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尝试。亚洲金融危机也让亚洲成功的典范——“发展型国家”进一步衰落。而这次金融危机同样可能带来重大的变迁。此次危机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势力。同时,这次危机也让不同的声音更为明显地表达出来。以往,不少学者常常对非洲固守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提出质疑,而非洲领导人往往对此置之不理。经济危机的冲击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提供了一次从根本上反思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机会。拉美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尝试改革,这些改革力图提高公民的基本保障和权力,而这些政策转向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②发展中国家不用再固守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发展,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不同的替代选择。可以说,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迅速发展为世界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我们还需要注意,中国自身也要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过分侵袭,这样才能成为世界发展更好的典范。市场化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市场化释放的能量不能被有效地管理,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社会也会出现反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业绩,这离不开中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的控制。有效的国家构建让中国能够防止市场化对社会造成的过度伤害。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导致“全球冲向谷底的竞赛(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全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情况。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市场化也在相应推进,如果听任市场化的扩展、听任“冲向谷底的竞赛”发生,不仅可能伤害社会,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因此,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中国也需要加强自身的国家构建,有效地抵制外力强加的市场化,积极为社会提供保护。唯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才能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10 - 09 - 30]

[修回日期: 2010 - 12 - 08]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① Jeffrey Frieden, “Sectoral Conflict and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2, 1988, pp 59–90

② Richard Westra, ed., *Confronting Global Neoliberalism: Third World Resista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tlanta: Clarity Press, 2010, pp 15–34

Abstracts

Political Calculations

Zhang Yuyan (1)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Domestic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Tian Ye (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ts have developed several important causal mechanisms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domestic politic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expresses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hange the existing equilibrium of information, power and interests distribution among various domestic actors if their preferences are given. When having strong constraints over state ac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play a role of signaling and commitment device in the context of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or redistribute the power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de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nevertheless, they are employed as a strategy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by some societal groups if they are weak.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domestic politic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Author】 Tian Y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China and World Development in Post-Crisis Era

Huang Qixuan (25)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world has been afflicted by developmental predicamen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akening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driving it into development crisis. Such predicament is the likely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 the U. S. Taking advantages of its privilege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by exporting neoliberalism, the U. S. change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indered their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neither handle the challenges both home and abroad nor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 S. and the rise of China has change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 to get out of the developmental predicament.

【Key Words】development predicament, state-building, neoliberalism, China

【Author】Huang Qixuan, Ph. D.,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rrency Crisis: Review and Evaluation

Ding Dou (46)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author tries to m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currency crisis. In the field of theory construction,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followed the economic model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dynamic game theory, introduced the formation of expectation,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raders, and brought the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riables into one analytical model. They stressed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the causes of currency crisis and making forecast. In the field of empirical research, by using the approach of expected utility function and strategic probability model,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successfully modeled the political factors, which are in nature the classified variables,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currency crisis, political economy

【Author】Ding Dou,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Economics Ph. D..